

外国历史小丛书

古代非洲与中国 的友好交往

商务印书馆

陈公元



外国历史小丛书

古代非洲与中国的友好交往

陈 公 元

商 务 印 书 馆

1985年·北京

外国历史小丛书

GŪDÀI FĒIZHŌU YU ZHŌNGGUÓ

DE YÒUHǎO JIǎOWǎNG

古代非洲与中国的友好交往

陈 公 元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687

1935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5 千

印数 10,100 册

印张 1 3/4 插页 1

定价: 0.27 元

11017·687

目 录

一	非中交往已有两千年的历史·····	1
二	第一个到达非洲的中国人·····	5
三	桑给国使者两次访华·····	17
四	汪大渊和《岛夷志略》·····	21
五	伊本·巴图塔和《游记》·····	26
六	郑和下“西洋”与中非友谊·····	33
七	相同的命运，共同的斗争·····	45

非洲和中国相距数万里，远隔印度洋，但是，自古以来，非洲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交往，就象那长江和尼罗河水一样，源远流长。这本小册子只是在中非关系的历史长河中，撷^[xié 协]取几片闪光的浪花，向读者简要介绍古代非洲与中国友好交往的一些基本情况。

一 非中交往已有两千年的历史

非洲同中国的交往，以北非和东非为最早。早在公元前两世纪（即我国汉代），非洲文明古国埃及就和中国有了间接的交往和海上贸易。

远在汉武帝（公元前 140—前 87 年在位）时代，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一条中西交通大道——“丝绸之路”。大量的中国丝绸和丝绸织品经过这条道路远销中亚和西亚，并通过叙利亚转运至埃及、地中海沿岸以及欧洲一些地区。那个时候，海上贸易也有了发展，我国已能够建造高大的海船。番禺（广州）从西汉前期起，就成了从事“珠玑^[jī 机]、犀、玳瑁”等海外珍品贸

易的港口。中国的商船从雷州半岛的徐闻县横越南海,绕过马来半岛,由暹罗湾入缅甸,到达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以黄金和丝织品同印度等地的商人交易“大珠、壁琉璃、奇石、异物”等。

当时,北非的文明古国埃及正处于托勒密王朝(公元前 305—前 30 年)时期,造船技术已相当发达。埃及的海船出红海,远航印度洋,到达印度等地,把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象牙、珍珠以及阿拉伯的宝石等转运到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各国。据说当时著名的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公元前 51—前 31 年在位)所穿的长袍,就是用中国的丝绸做成的。

公元前 30 年,罗马帝国侵入埃及,并将埃及变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罗马帝国通过埃及的亚历山大和迈奥霍穆等港口,同印度、斯里兰卡等东方国家开展了海上贸易,进而扩大到中国沿海;埃及商人把从印度和中国买到的货物,又经过亚历山大港(避免横越阿拉伯的商道)输入罗马。

公元二世纪时,罗马帝国同我国开始了直接的海上交往。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即罗马帝国)“王常欲通使于汉”,但为安息(波斯)所阻。公元 162—165 年,罗马帝国皇帝安敦(即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斯,公元 161—180 年在位)遣将击败安息军队,夺

取了美索不达米亚，控制了波斯湾。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 166 年），安敦皇帝遣使经日南（越南）来中国访问，并向汉朝政府赠送象牙、犀角、玳瑁等贵重礼品。经过后人的研究和考证，当时大秦的使者是从海道来华的，使者带来的礼物则来自东非海岸一带地区。这是非洲物产传入我国的最早记载，也是我国同非洲贸易交往的历史见证。

中国同大秦的海上贸易交往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同北非的海上交往。我国对于非洲的了解也逐渐增多。三国时期，鱼豢所著《魏略·西戎传》一书中提到“大秦国”的“乌迟散城”，“乌迟散”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该书还详细记载了从波斯湾和美索不达米亚通往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水路和陆道。

三国时期，大秦国的商人于孙权黄武五年（公元 226 年）又一次来我国访问，受到孙权的盛情接待。孙权亲自询问有关大秦国的“方土谣俗”，他对发展中国同罗马帝国的海上贸易很感兴趣。当时康泰编撰的《吴时外国传》一书，还记载了中国通航大秦的情况。

南北朝时期，我国的海外贸易继续发展，我国的远洋帆船越过印度半岛，直航波斯湾头，在幼发拉底河畔的希拉城下时常有中国商船停泊，同云集此地的各国商人开展贸易活动。罗马帝国的商人也从埃及出红

海,越过印度洋,不断来到我国经商。“舟舶继路,商使交属”,海上交通盛极一时。在这些“商使”中,也有从埃及直接来华的非洲商人,他们为发展古代非洲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非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也逐步加深。公元 60 年,一个长期居住在埃及的希腊商人,写了一本名叫《厄立特利亚海航行指南》的书,第一次向非洲人民介绍了中国的情况。书中说:到了秦国(指中国),大洋就止于此了;秦国北方有一个很大的城市,名叫秦尼(指长安);秦尼的绸缎由陆路经大夏而远销印度。

公元 150 年,埃及亚历山大港的著名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所著《地理书》中,也介绍了中国的情况。他把中国称作“秦尼国”,认为中国的首都处于世界东方的边沿,其经度距亚历山大港为一百一十九点五度,时辰相差约八小时(实际上,亚历山大港距中国长安约七十九度,时差约五小时左右)。

公元 545 年(即我国南北朝梁武帝大同 11 年),埃及亚历山大的商人兼旅行家科斯马士写了一本名为《基督教诸国风土记》的书,该书对中国的描述比《厄立特利亚海航行指南》和《地理书》中的记载更为翔实。书中记载了中国丝绸从陆路经过许多国家,辗转贩运到

波斯的情况，还详细记载了中国丝绸沿海道经斯里兰卡转运到印度，再经印度转运到波斯湾和红海等地的情况。科斯马士特别指出斯里兰卡在当时东西方贸易中的重要性，说斯里兰卡地位适中，中国、印度、波斯以及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等地都有许多船舶航行到该岛，进行转运贸易。书中还指出，中国位于亚洲极东部，同“巴巴利右岸”^①环绕同一个大洋，这就是印度洋。可见，当时的非洲人不仅知道中国是盛产丝绸的国家，而且还知道通向中国的陆上和海上的详细路线。

二 第一个到达非洲的中国人

中国同非洲的贸易交往，虽然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但是，直到公元八世纪中叶以前，我国史籍中还没有中国人涉足非洲的确切记载。有史可考的第一个到达非洲的中国人，是唐代著名学者杜佑的族子杜环。他回国后撰写的《经行记》一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西亚非洲游记。

杜环到达非洲，并不是偶然的。唐朝（公元618—907年）统一中国后，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农业、手工

^① 所谓“巴巴利右岸”，指非洲东海岸，即今天索马里的柏培拉到摩加迪沙一带。

业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商品经济日趋繁荣,它促进了唐朝的海外贸易和对外文化交流。闻名世界的我国四大航海木帆船之一的“中国沙船”,首先在上海崇明县出现。这种沙船高达两、三层,装备了深水测深设备^①,能直接航行波斯湾。据唐代来我国访问的阿拉伯航海家苏莱曼在公元851年(唐宣宗大中五年)所著的《中印游记》(即《苏莱曼东游记》)一书的记述,唐代中国海船特别巨大^②,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海船能航行无阻,因而阿拉伯东来的货物,都用中国船只装载,许多阿拉伯商人经常乘中国海船到达印度或来中国访问。《苏莱曼东游记》中还记载了当时中国商船经印度洋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驶向埃及,同非洲开展海上贸易的情况。

唐代我国同非洲的海上交往,还可以从当时我国一些学者的著作中得到证明。唐代著名地理学家、唐德宗时期的宰相贾耽(公元730—805年),在其所著

① 当时测量海水的深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下钩”测深,一种是“以绳结铁测深”。据史书记载,有时测得的结果是,“纲长五十余丈,才及水底”。

② 《苏莱曼东游记》中曾记述,各国船只到达南印度的故临国(今魁郎)时,都须纳税,中国海船由于装载量特别大,须纳税一千迪尔汗,他国船只,按其载重量,只要缴纳一至十个第纳尔不等。当时的阿拉伯钱币,二十二个迪尔汗(银币)等于一个第纳尔(金币),那么,中国船只所缴税款即为其他国家船只的几倍甚至几十倍。由此可见中国海船之大。

《皇华四达记》一书中，记载了中国通向四邻诸国的几条交通线，其中有一条是“广州通海夷道”。根据他的记述，这条海上航线共分两段，前段是从我国广州出发，越过南中国海，横穿马六甲海峡，入印度洋，经印度、斯里兰卡，入阿曼湾，到达波斯湾头的奥波拉和巴士拉（在今伊拉克境内）；最后，溯底格里斯河上航至阿拔斯哈里发的首都巴格达。后段，是从波斯湾头的奥波拉和巴士拉出发，经巴林岛的麦纳麦港、阿曼的苏哈尔港，出阿曼湾，再经阿曼的哈德角，循阿拉伯半岛沿海南下，经南也门的席赫尔，入亚丁湾，渡曼德海峡，最终到达“最南边”的“三兰国”。这个“三兰国”，就是今天红海南岸索马里的泽拉港^①。泽拉是当时国力十分强盛的“拔拔力国”（即埃及人科斯马士在《基督教诸国风土记》一书中所说的“巴巴利”国）的都城，也是非洲同阿拉伯国家和亚洲国家进行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贾耽记载的这条航线，实际上是当时中国帆船在阿拉伯地区和非洲东海岸进行三角贸易的航行路线。唐代，中国帆船越过印度洋，到达南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魁郎后，常常横越大海，到达阿曼的苏哈尔，再从苏哈尔进入波斯湾，同两岸的阿拉伯国家进行贸易活动；或者从苏哈尔来到阿曼著名的香料贸易中心佐法尔港，

① 有的学者认为：“三兰国”在今天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

采购那里的名贵香料；再从佐法尔出发，赶在东北季风末期，沿“阿拉伯香岸”^①南航泽拉，把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带给非洲人民，运回东非一带出产的象牙、香料、药材等。贾耽所记述的航线十分具体而又准确，但他本人并未去过波斯湾或东非海岸，可能是通过向商人和航海家采访了解到的。这也证明唐代中国的商人和航海家确实远航到达波斯湾和东非海岸一带。否则，贾耽就不会有那么详细、准确的记载。

正当我国唐朝在东方发展到很强盛的时候，阿拉伯帝国（我国古代称其为“大食”）也在亚洲西部崛起。阿拉伯人在公元640年取代了东罗马帝国对埃及的统治，于公元八世纪初征服了马格里布（包括北非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三国）。北非的其它地区也被纳入大食帝国的版图。阿拉伯商人很早就懂得利用印度洋上的季风航行到非洲东海岸进行贸易。从公元695年开始，阿拉伯人更直接向非洲东海岸移民。

据记载，我国唐朝和大食帝国之间有过较多的接触和贸易交往。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公元644—656年在位）派使者

① 阿拉伯半岛南岸从阿曼的佐法尔地区到南也门的哈达拉毛一带，都盛产各种名贵香料，因而被称为“阿拉伯香岸”，在当时与索马里的“香料之角”（瓜达富伊角）齐名。

来我国访问，开始了大食与中国的正式官方交往。据我国史书《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记载，从永徽二年到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的一百多年里，大食官方遣使来华访问达三十六次之多。此外，民间的往来就更加频繁了。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仅在扬州一地的大食人和波斯人就有好几千。据阿拉伯航海家苏莱曼的记述，唐末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和其他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有一个时期竟达十二万人。中国和大食之间这种频繁的往来，促进了中国同阿拉伯人统治下的北非和东非的交往，加深了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可是，大食和中国之间也曾发生过战争。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镇西节度使高仙芝奉诏西征石国(今苏联塔什干一带)，石国向大食求援。于是唐军和大食军队发生冲突。在怛[dá 达]逻斯(今苏联吉尔吉斯的塔拉斯)战役中，唐军为大食和石国的联军所败，两万大军覆没，随军人员有不少被大食所俘，杜环就是其中之一。杜环被俘后，跟随大食军队西行，游历阿拉伯各地，最后来到当时新取得政权的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库法城，在阿拉伯居留了十一年，宝应初年(公元762年)才从波斯湾搭商船沿印度洋海路回到广州。

杜环回国后，撰写了《经行记》一书，把自己留居大

食期间游历各地以及回国途中在非洲和印度洋沿岸的见闻、经历记载下来。可惜的是，《经行记》原著已佚失。我们现在能见到的该书部分内容，是杜环的族叔杜佑在其《通典》一书中所引用的《经行记》中的一些片断，共约有一千五百多字，提到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名字，其中属于西亚的有大食、苫[shān 山]国(叙利亚)、拂菻(即拜占庭帝国)等国；属于非洲的有摩邻国。

“摩邻国”，在今天北非的摩洛哥一带。“摩邻”是阿拉伯语“马格里布”的译音。《经行记》记载说：“又去摩邻国”，可见，杜环在回国途中，确曾到过北非一带。

《经行记》关于“摩邻国”的记载，对了解古代北非的历史、地理、物产、宗教、习俗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书中说：摩邻国“在秋萨罗国西南，渡大磧[qì 气]，行二千里至其国。”“秋萨罗”即古西班牙。这就是说，“摩邻国”的位置在西班牙的西南方，从西班牙到该国有二千里的路程，还要越过大沙漠。书中还说这里的人民皮肤很黑，性格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鹑[gǔ 骨]莽”。“鹑莽”是一种椰枣，即波斯枣，今天通称伊拉克蜜枣。由于北非一带自然条件与西亚差不多，因此粮食作物较少。人们以干鱼饲养牲口，以椰枣作为主要食品。这些都是符合古代马格里布一带的情况的。

《经行记》关于伊斯兰教教义和法规的描述，是研究伊斯兰教史的珍贵史料。书中说“摩邻国”和“陆行之所经”的其他国家，有三种宗教信仰，即“大食法”（伊斯兰教）、“大秦法”（基督教）和“寻寻法”（祆教）。关于基督教和祆教的介绍十分简略，而对伊斯兰教则介绍得非常详细、准确，因为伊斯兰教正是当时在西亚北非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唐代，非洲也曾有人来过中国。我国《新唐书·南蛮传》记载说：室利佛逝（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于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献侏儒、僧祇〔zhī 指〕女各二”。还说：元和八年（公元813年），诃陵国（在今印尼爪哇岛）“献僧祇奴四”。《旧唐书》也记载说：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诃陵国“遣使献僧祇僮五人”；“十三年（公元818年）遣使进僧祇女二人”。“僧祇”是“桑给”的译音，古代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把东非黑人称为“桑给”，因此，“僧祇”是指东非海岸一带的黑人^①。从当时的记载来看，这些黑人大都是由别的国家转送到我国来的。在我国唐宋时代的一些史籍中常将“僧祇人”称为“昆仑奴”。唐代的传奇故事集《太平广记》中就有不少关于“昆仑奴”的描述，把他们说成是一些技艺非凡、勇敢机智而又具有侠义心肠的人。唐代流行的民间舞蹈里

① 唐代樊绰写的《蛮书》中，也把东非黑人称为“僧祇人”。

还有扮演非洲黑人的角色，如当时盛行的一种“太平乐”，也叫做“五方狮子舞”，持绳牵狮子的就是一个非洲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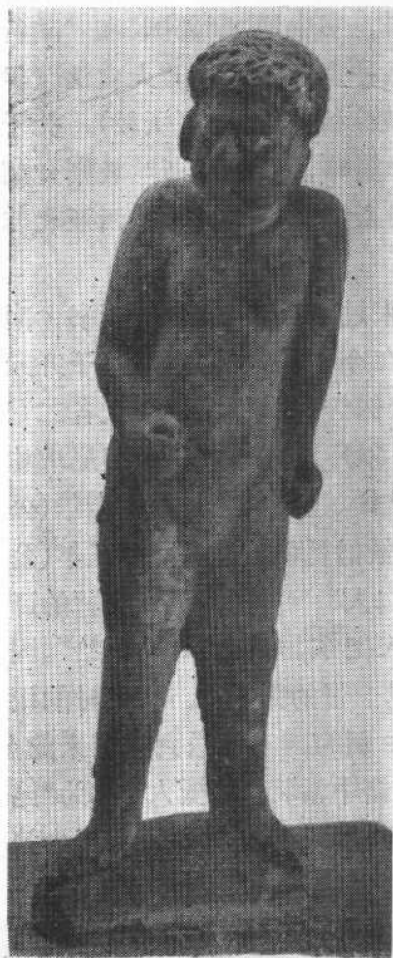


图1 西安出土的唐代黑人陶俑

1954年，西安市南郊(古长安)嘉里村唐代裴氏小娘子墓里出土了一批文物，其中有一件黑人陶俑，高十五厘米，上身裸露，隆乳鼓腹，下身穿一短裤，右臂微屈，手置腰部，左臂下垂，站在一块踏板上，显得非常坚强健壮。他全身除短裤外，都被染成黑色。肤色纯黑，头发也是黑色，卷曲成细螺旋状，唇红眼白，没有胡须，脸较小，稍扁平，额微凸，鼻梁不高，鼻翼较宽，嘴唇较厚。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从肤色、发

型、身躯、容貌来看，他是典型的非洲黑人的形象。

据墓志记载，裴氏小娘子是已故相国、郇〔xún 旬〕国公裴均的孙女，卒于唐大中四年(公元 850 年)。裴氏小娘子墓出土的黑人陶俑说明，在唐代(至少是在公元 850 年之前)，非洲黑人确曾来过我国。陶俑形象逼真、生动，又说明陶俑作者对他创作的对象——非洲黑人是非常熟悉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当时的唐朝首都长安确实有一定数量的非洲黑人来过或居住在那里。

裴氏小娘子墓里出土的黑人陶俑，是唐代中国和非洲人民之间友谊的象征，也是唐代中国和非洲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在唐代，中非之间的海上贸易也有一定的发展。唐朝政府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多次明令保护外商并鼓励外商来华贸易^①。唐朝政府之所以重视海洋贸易，除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上层阶级需要通过海外贸易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物品，特别是香料、象牙等奢侈品；而非洲，特别是东非海岸各国，正是香料和象牙的盛产地之一，因此，唐代

① 例如：唐文宗大和八年(公元 834 年)下令保护广东、福建、扬州的外商，规定：“除舶脚(即下碇税)、收市(先买宫廷所需蕃货)、进奉(即贡献)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